

戴逸 主编

二十世纪中国著

名学者传记丛书

冯友兰

学术思想评传

宋志明 梅良勇 著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戴逸 主编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

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

宋志明 梅良勇 著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/宋志明,梅良勇著. - 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.7

(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/戴逸主编)

ISBN 7-5013-1625-2

I. 冯… II. ①宋… ②梅… III. 冯友兰－评传 IV. 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7202 号

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
书名 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
Feng Youlan Xueshu Sixiang Pingzhan
著者 宋志明 梅良勇著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原书目文献出版社)
发行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(毫米) 1/32

印张 9

字数 220(千字)

版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书号 ISBN 7-5013-1625-2/K·287

定价 18.00 元



冯友兰先生
(1895-1990)

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

(代序言)

戴 逸

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,应该说: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、创新的世纪、辉煌的世纪。一百年间,名家辈出,群星灿烂,成果丰硕,推陈出新。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,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,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、撞击、融合中,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,并迅速地茁壮成长。一百年内,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,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。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,明辨其是非得失,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,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,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。

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,历史悠久,源远流长,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。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,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,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。西学东渐,经历了几个阶段,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,其后是制度文明、精神文明的传播,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。西方的学术文化,涵盖广阔,影响深远,进入中国后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,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。其间,中学和西学、旧学和新学、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。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。

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,19 世纪末,他翻译了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,使中

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此后,他又陆续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,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,甄克思的《社会通诠》,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,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,穆勒的《穆勒名学》,耶方斯的《名学浅说》,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、著述的领域,中国近代的经济学、政治学、法学、社会学、逻辑学得以借鉴,因之萌生。

1901年,梁启超发表《中国史叙论》,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:“自世界学术日进,故近世史家之本分,与前者史家有异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,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,与其原因结果。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,虽名为史,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,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,即国民全部之经历,及其相互之关系。”他大声疾呼,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,发生革命性的变化,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,他说:“史界革命不起,则吾国遂不可救,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。”此时,夏曾佑编写《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。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,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《法学会杂志》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;王国维、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;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、王国维研究叔本华,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;五四时代,陈独秀、胡适鼓吹文学革命,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,胡适写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。至于自然科学,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、徐寿、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,做了大量准备。1915年,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《科学杂志》,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。

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,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。西方的各派学说,众多著作,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,冲进中国。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、甄

别、吸收，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。学者们，作为中国人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在中国接受教育，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。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，从旧时代过来，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，如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吴虞等，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，竭力反对旧传统，要与旧传统决裂，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。真像他们自己所说：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，进行了反戈一击。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“全盘西化论”者，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。只要你是中国人，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，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，“今日之我”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“昨日之我”。

同样，20世纪的中国学者，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、顽固，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。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、优越性日益明显，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，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。近代生活中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，西服革履、西装大菜、洋房高楼、汽车飞机，西方文明，无处不在，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？茅盾在《子夜》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，顽固不化，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，口诵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居住的却是洋房，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。拖着辫子，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。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，人们都在亦中亦西、非中非西、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。

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。历史上，佛教文化传入中国，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，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，才逐渐地融合，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——禅宗，和佛学化的儒学——理学。明清之际，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，虽有徐光启、李之藻甚至顺治帝、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，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，经一、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，并未能

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，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，是一个长期、缓慢而艰难的过程。

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，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，其声势之大，影响之远，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。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，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相形见绌，在上个世纪末，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，中学已阵脚大乱，败下阵来。必须吸取西学之长，“以洋为师”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，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。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，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，脱颖而出，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。

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，大体上说，有以下特点：

一、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。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，颂先圣而薄后王，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，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，故而欺凌争斗，社会日益退步。19世纪末，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，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，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，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，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。这样，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，树立起近代新观念。五四运动前后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，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，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，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。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。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。而在1949年后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，在它的哺育下，诞生和成长了大批学者。

二、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。中国传统学术，分成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，其中经学特别重要，凌驾于上，且涵盖一切。《易经》中包括数学、哲学、自然科学；《书经》中包括政治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；《诗经》中包括文学、艺术、

自然科学；《礼记》中包括政治学、伦理学、教育学；《春秋》中包括历史学、政治学。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，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，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、规模齐备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。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，独立为一大学科。其中分门别类，学支林立，建立了数、理、化、生、农、工、医等大学科，门类繁多、内容充实，洋洋大观，达到了较高水平，且有裨于国计民生。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，文史哲分离，形成各自的专业，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社会学、新闻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等新学科，纷纷诞生独立。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，人们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，知识量、信息量巨大增长，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，范围日益扩展，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旧框架，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。

三、理性方法的运用。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、逻辑不够严谨，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。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，冥心静思，自省修养等等。某些非理性的方法，如形象的、感悟的、信仰的、揣测的、情绪的方法，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、或虚幻的状态，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，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，天人感应说，明心见性说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，运用归纳和演绎，重视证据，“无征不信”、“孤证不立”，摒弃主观成见，抱着冷静、客观的态度，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、准确的认知活动。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、望远镜、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，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，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。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，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。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、信仰或权威。

四、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中国进入20世纪，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，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，内忧外患，民

不聊生。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，人民苦难，抱着无限的同情，唤起自己的责任感，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，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，矢志钻研，目的就是为了救国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。反对帝国主义侵略、反对封建主义压迫，使国家富强，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。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，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，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，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，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，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，它推动国家的前进、呼唤民族的奋起、激励大众的斗争，因此，爱国主义渗透其中，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。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。

此文原为《二十世纪中华学案》序言，现作本书代序，并加标题。

目 录

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(代序言)	戴 逸
导 言	(1)
第一章 好学深思之士	(4)
一 生于书香之家	(4)
二 选定哲学专业	(7)
三 加盟清华学派	(18)
四 贞元之际著书	(25)
五 顺世道术变迁	(34)
第二章 扣开哲学之门	(39)
一 《人生哲学》缘起	(39)
二 《人生哲学》述要	(43)
三 《人生哲学》评析	(60)
第三章 梳理中国哲学史	(68)
一 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写作与出版	(68)
二 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分期	(71)
三 《中国哲学史》的特色	(77)
四 《中国哲学史》的影响与价值	(88)
第四章 新理学的形上学	(99)
一 “理”、“大全”是事物依照的本体	(100)
二 “气”是事物依据的条件	(107)
三 “道体”是事物得以派生的运动过程	(112)

第五章	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	(120)
一	从工夫论到方法论	(120)
二	正的方法：逻辑分析	(123)
三	负的方法：直觉表显	(140)
第六章	了解和觉解	(144)
一	“了解”及其限制	(145)
二	觉解及其功用	(150)
三	知行各有难易	(155)
第七章	人生境界	(159)
一	自然境界：被动的人生	(160)
二	功利境界：主动的人生	(164)
三	道德境界：自觉的人格	(166)
四	天地境界：理想的人格	(170)
第八章	《新事论》与《新原道》	(177)
一	“文化类型”说	(177)
二	“继往开来”说	(182)
三	“道统新续”说	(186)
第九章	批判与回应	(192)
一	陈家康对新理学的批判	(192)
二	杜国庠对新理学的批判	(203)
三	胡绳对新理学的批判	(214)
四	贺麟对新理学的回应	(220)
第十章	重写中国哲学史	(224)
一	恢复学术自信	(224)
二	通论古今中国哲学	(231)
三	几个“非常可怪之论”	(239)
第十一章	巨擘 重镇 哲人	(244)
附 录		(249)

冯友兰学术年表.....	(249)
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论著目录(1983—1998).....	(263)
后 记.....	(272)

导　　言

冯友兰(1895—1990)生于19世纪末，卒于20世纪90年代，在20世纪的中国著名思想家当中，他大概是学术生命最长的一位了。

早在20世纪20—30年代，他学成回国，先后执教于中州大学、广州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，就已成为哲学界著名的教授之一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，冯友兰写出博士论文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(又名《天人损益论》)，顺利通过毕业答辩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。回国以后他沿着博士论文开辟的研究方向，致力于人生哲学的研究，写成小册子《一种人生观》，被商务印书馆列入“百科小丛书”出版。这是他写的第一本中文学术著作。1926年，他以《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》(英文版)和《一种人生观》为基础，写出《人生哲学》。这是一本高中教科书，曾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一定影响，可惜并没有引起哲学界的广泛注意。其实，他在这本书中已表明自己已确立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，并且开始探索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的道路。因此，可以说《人生哲学》是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，是为他后来建立新理学思想体系奠立的第一块基石。1926年冯友兰到燕京大学任哲学教授，讲授中国哲学史，着手编写《中国哲学史》教科书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论文，把学术研究的重点从“论”转向“史”、从人生哲学转向中国哲学。1931年他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上册，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。1934年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下册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1935年，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两册合订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，列入“大学丛书”。在冯友兰之前，胡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可惜只有上

卷,算不上系统的大学教科书。冯友兰做了胡适想做而没有做的事,第一个写出《中国哲学史》这一高水准的大学教科书,为这一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《中国哲学史》的问世确立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界执牛耳的学术地位,也为他新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作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,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

到30年代末和40年代,他的学术思想发展历程从理论准备阶段转向理论成熟阶段。1937年在清华大学南迁的路上,冯友兰开始构思起草,1939年写成《新理学》(商务印书馆出版),阐述他自己的哲学观点。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新理学思想体系基本形成。这时,他不仅以中国哲学史家的身份闻名于世,还以哲学家的身份蜚声哲学论坛。理论创造的闸门一打开,独到的思想有如潮水奔泻。紧接着,冯友兰在1940年又出版了两本书。一本是《新世训》,由开明书店出版。在这本书中,他运用新理学观察人生问题,提出新理学的修身理论。他曾在大学设置修身课程,为大学生们讲授此书。另一本是《新事论》(又题《中国到自由之路》)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在这本书中,他运用新理学观察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,提出他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出路的构想。1942年他的《新原人》一书脱稿,在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上连载,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这本书阐述了新理学的人生哲学,与《新理学》相互照应,显示出新理学思想体系由本体论讲到人生论的理论架构。新理学思想体系问世之后,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和辩难,1943年冯友兰在《哲学评论》第8卷第1—2期上发表长文《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》,对学术界提出的几种批评意见作出答辩。此后他在该文的基础上又写出两本书,对其新理学思想体系作了补充论证。一本是《新原道》(又题《中国哲学的精神》),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另有英文版在国外广泛流传。在这本书中,冯友兰运用新理学观点诠释中国哲学,力图证明新理学开出中国哲学的“新统”,代表着中国哲学的“最新进展”。

另一本是《新知言》，194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在这本书中，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“形上学不能讲”的说法作出回应，声称新理学找到了讲形上学的正确思路。从 1939 年到 1946 年 7 年的时间里，冯友兰连续出版 6 本书。他称这些书为“贞元之际所著书”，意即这些书一方面宣告旧时代的终结，另一方面宣告新时代的到来。通过“贞元六书”，冯友兰创立了富有新意新理学思想体系，使他成为当时大学中名声最大、影响最大的哲学家。

50—60 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。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尚在国外讲学的冯友兰谢绝留他定居的邀请，匆匆返回祖国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他毅然放弃多年形成的新理学思想体系，转变学术立场，接受马克思主义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，为发展新中国的学术事业付出极大的努力。在这一期间，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，著有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第一册和第二册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》、《中国哲学史史科学初稿》、《四十年的回顾》等书。他感受到学术研究带来的喜悦，也感受到“左”的思潮的冲击给他造成的种种烦恼。

80—90 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定型期。经历“文革”灾难之后，他总结经验教训，排除“左”的思潮的干扰，恢复了学术自信心。他表示，自己并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，但要用自己所理解、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，不再轻信所谓“理论权威”的说法。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历程，冯友兰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在助手的帮助下，笔耕不辍，终于写下了 7 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，安心地乘鹤西去。

冯友兰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哲学（尤其是中国哲学）研究，创获颇多，20 世纪中国哲学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有关。我们要想了解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史，不能不了解冯友兰；我们要想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，不能不研究冯友兰。

第一章 好学深思之士

一 生于书香之家

冯友兰，字芝生，1895年12月4日（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日）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，1990年11月26日卒于北京。

据冯友兰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一书中讲，他的祖上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，先是做点小生意谋生，后来便在祁仪镇落了户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冯家在当地终于成为望族。冯友兰出生时，冯家已是一个由几代人组成的大家庭，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。那时冯家大概有1500亩土地，虽算不上首富，日子还是比较宽裕的。祖父是一家之长，带着全家几十口人平安度日。

冯家在当地也算得上书香之家。冯友兰的祖父冯玉文（字圣征）曾考过秀才，已达到录取标准，只因得罪了县官，又不肯去疏通，才没有被录取。他从此便告别科场，不再应试。他虽没有取得任何功名，然而开启了“耕读传家”的家风。他的诗写得很好，有一种淡闲之趣，编有《梅村诗稿》。邻县新野县的名士赵一士颇欣赏他的诗作，为他的诗集题了这样一首诗：

身处人间世，心怀太古村。

风流伊上叟，击壤作尧民。

在赵一士看来，冯玉文的诗集可以同北宋理学奠基人之一邵雍的《击壤集》相媲美。